

对新中国 60 年外交的思考

李 杰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处长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新纪元，也开启了新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历史航程。60 年来，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超越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超越了西方传统外交理论中的“均势”、“权力”、“遏制”、“干涉”、“同盟”、“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等概念，坚持科学精神，把握时代潮流，体现人类共同理想。既立足于指导中国的发展，同时“达济天下”，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突出和平、合作、共赢、和谐的精神。既有中国特色，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普世价值，为实现建设人类共同期盼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世界提供了新的启迪和动力。

一、60 年新中国外交实践

(一) 秉承传统，以“和”一脉相承

“和”是中国外交实践的主旋律。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谐世界，“和”成为贯穿中国外交实践的一条红线。

“和”的精神，是承认、尊重、圆融。“和”的内涵，是和平之和、包容之和、不同之和，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统一，是保存差异、个性的对立和谐。“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以合作求共赢，和睦相处，共生共长。“和”的思想，既是理想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在“和”的思想指导下，60 年中国外交实践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相互促进、互利互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相互信任、协调合作，用和

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世界多样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和”的思想，深刻融入到 60 年中国外交实践的方方面面。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提出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思想。1953 年底，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并于次年先后与印度、缅甸两国正式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 年 4 月，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会议公报，成为“万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亚洲走向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和宗旨一致，是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的理想原则。实践证明，只要切实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有国家，包括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都能实现友好相处，互利合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会出现对立或紧张，甚至发生战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有力促进了中国的睦邻友好，拓展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友好合作，也为广大新兴国家捍卫独立和主权提供了有力武器，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新时期，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推进。不仅强调共处，同时强调共进，通过走和平、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实现与世界的共同进步。和平发展道路突出的是和平，重视的是合作，追求的是共赢，是一条在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全方位开放和与世界相互依存的道路，一条将自身利益与各国利益紧密相连的道路。中国外交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中国以什么方式实现民族振兴这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指导下,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重视互利互信、平等合作、共生共赢,反对强者尽得、弱者尽失,反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与世界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实现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这是中国在外交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应该推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样一个世界等问题。和谐世界坚持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是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做出的选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升华。

(二) 和合偕习,合作性外交突显

中国始终认为,多样化的世界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互依赖的一面,各国之间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有条件、有意愿、有能力、有必要开展广泛合作。在新中国 60 年外交实践中,重视合作,突出合作,推动合作。政治上,坚持以对话与合作处理矛盾、化解分歧,扩大与各国利益的汇合点。经济上,坚持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同时以合作促发展,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安全上,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解决争端,促进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在合作中,中国外交重视处理维护自身利益与尊重他国利益的关系。倡导求同存异,注意考虑合作伙伴的合理诉求和关切,不损人利己,不以邻为壑,最大限度地寻求利益契合点,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主张,合作决不是“一团和气”,不是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以迎合他人,而是要“致中和”,在承认多元性、多样性、矛盾性的前提下,找出统一性和共同点,找出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进而求同存异,争取实现问题的解决。合作的前提是坚持原则,不回避、不掩饰矛盾。对损害中国核心

和重大利益的行径,对违背国际社会意愿、破坏国际和平与正义的言行,中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斗争推动实现了更加稳定和长远的合作。

通过广泛开展合作,中国为自身发展赢得了和平友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建交国已由 1951 年的 18 个发展到 2008 年的 172 个,参加了 300 多个国际条约,130 多个国际组织。外交领域不断拓展,外交影响力不断提高。

通过广泛开展合作,中国推动了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给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启迪,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贡献,^[2]为推动重大地区和国际冲突的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通过开展反恐、军控、维和、发展、人权、司法、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合作,通过妥善应对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以及印巴核试验、伊拉克战争、伊朗核、朝鲜核等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通过广泛开展与周边国家、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树立了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勇于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坚定力量。

(三) 乘势待时,外交布局发挥 总体外交优势

面对国际格局和中国外交环境不断出现复杂深刻变化的形势,中国外交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努力开展全方位对外交往。通过首脑外交、高层互访、战略对话,以及经济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全方位对外交流与合作,广交朋友,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60 年来,中国坚持发展与发达国家关系,通过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1979 年 1 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先后签署三个联合公报,^[3]结束了长期敌对状态。2009 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成功会晤,双方决定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即开始同西欧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1978 年,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中欧关系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迈进，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开展了友好合作。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的合作不断拓展与深化。中国与俄罗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不断充实、完善，与日本战略互惠关系保持了改善与发展的势头，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稳定发展。

中国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中国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了 90% 的陆上边界问题。中国多次向遭受各种灾害困扰的国家和人民迅速无私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作为首个非东盟国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 年与东盟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签署《南海地区行为准则》。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解决东海、南海领海争端，推动共同开发迈出新步伐。中国积极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积极参与柬埔寨、阿富汗等问题的政治解决，努力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调解南亚地区国家间的冲突，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

中国始终把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坚定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1956 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1959 年古巴革命、1964 年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以及其他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得到了中国的无私援助。中国政府一直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内容，1963 年底到 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 13 国，提出中国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对增进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被誉为“解放之路”、“南南合作之路”，成为中非人民团结合作的象征。1978 年以

后，中国继续扩大、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与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里约集团等发展中国家集团和组织加强了磋商，同发展中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与太平洋岛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与南太平洋论坛等地区组织建立了联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内涵更加丰富。中国认真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真诚的援助，向 110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 2000 多个援助项目，对 40 多个不发达国家减免了 200 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的创立与发展，成为新时期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集体对话与合作的成功尝试。

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促进全球资本流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认真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作用，广泛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1989 年以来，中国共向 16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 7000 多人次，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名列前茅。中国致力于国际军控和裁军事业，^[4] 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实施，制订了全面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并不断加强执法工作。中国高度重视能源和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负责任的一员。^[5] 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阐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负责态度和切实举措，表明了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能源和气候问题的决心。

(四) 圆通融合，外交风格刚柔相济

60 年来，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威胁和考验。

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冲击，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和“9·11”事件、朝核危机、印度洋海啸等重大国际、地区突发事件、特大自然灾害等的考验，中国外交始终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在丰富的外交实践中创造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

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不畏强权、不卑不亢，不惹谁也不怕谁，不逞强也不示弱，不当头也不做附庸。重视理而不是力，坚持以理服人，不恃强凌弱，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坚持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敢于和善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坚持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坚决抵制外部干涉和压力。坚持以真诚、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反对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划线，积极扩大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相处。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是中国外交风格的重要方面。作为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光辉榜样，周恩来总理经常强调，原则不能让，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中国外交通过“武戏文唱”，实现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通过“小球转动大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通过建交、半建交和保持民间交往等形式，逐步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最终实现全部建交的目标。中国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与周边国家邻海、领土争议等问题，都是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

（五）以曲致全，外交策略高超运用辩证法

中国外交始终坚持从全局和大局出发，从事物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入手，准确把握和自觉运用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重视分清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深刻认识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

在与各国开展友好交往中，中国不争夺领导地位。维护自己的发展利益，同时尊重别国的发展利益，努力寻求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友好对话与协

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对于历史恩怨及领土争议等难点问题，目标明确、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通过解决具体问题，为双方相互妥协、实现共赢预留空间，为最终解决创造条件。

（六）顺天应人，外交决策更加民主科学

“以人为本”是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出国留学、商务考察、劳务输出、海外移民人数的增多，公民个人日益成为中国外交工作服务的重要目标。中国外交更加重视把人民作为外交工作的基石和后盾的力量，重视调动民众在推进外交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外交部公众外交处、领事保护处等新职能部门的设立，为中国外交贯彻“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解密部分档案、举办“公众开放日”，邀请各界民众与外交部部领导、司领导见面，为与民众近距离接触、了解和理解外交工作和外交政策理念提供了便利。“外交部公众信息网”定期公布“访问量排名”、“最受欢迎新闻”、“网站访问者来源”等，有效地吸纳了公众的关注、参与和民间智慧。专家咨询活动、不同形式的课题讨论和座谈会，有效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外交资源，推动实现外交决策走向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涉外事务联席会议的增多，减少了外交决策可能发生的误判。涉外职能机构相互协调力度的增强，推动了外交决策向科学化方向迈进。

二、60年新中国外交理论，彰显中国特色

（一）既是理论，也是实践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思想基础上，通过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

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规律的新认识。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外交理论，而是通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根据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中包涵的重要认识、主张和原则立场确立的中国新时期外交路线，为中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更好地掌握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要求、制定有利于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基础，以和平、发展、合作为旗帜，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目标，以和平发展为道路，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基本途径的整体体系。这一理论以和平发展为主线，始终贯穿着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合作、和谐的哲学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构成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三大核心理念。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全面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向世界回答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奉行什么政策、坚持什么战略、主张建设什么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走向的普遍关切和疑虑。以“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回应了“中国威胁论”，以“中国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回应了“中国责任论”，以“中国建设和谐世界”回应了“中国霸权论”，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愿意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积极参与现有国际体系并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二）既是传统，也是时代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 60 年发展与改革开放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源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

现，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中国化。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根植于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独立自强、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开放包容，讲信修睦、和谐共生，图新变革、天人合一等精神，贯穿了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历史，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价值取向，并融入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支撑下，中国结合本国国情与时代潮流，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重大外交理念。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实事求是、求同存异、不畏强权、扶弱济困、主持公道，生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丰富的外交实践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60 年外交的光辉历程，中国不断总结外交实践创造的鲜活经验，将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这一外交理论提炼升华了中国发展各领域、各层次对外关系的合理因素和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和外交实践的科学认识和把握。

（三）既是外交，也是内政

60 年来，中国通过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外交与内政同步互动。外交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中国的国内发展需要紧密相连。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始终贯穿着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主线。

新中国外交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发展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另起炉灶”^[6]、“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7]和“一边倒”等政策。20 世纪 50 年代，美帝国主义集团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对新中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为了保卫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不怕压，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之后又根据形势发

展变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中间地带”以及“三个世界”^[8]等战略方针和理论。特别是在 70 年代初，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不断扩张，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以放眼全局的雄才大略和胆识，将中国对外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性高度结合，提出“一条线”、“一大片”^[9]的战略构想，以“小球转动大球”，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中国外交迈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步伐，大大拓宽了外交回旋余地，为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国家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政策奠定了中国的外交基石，使新中国巩固了独立，维护了主权，走向了世界，屹立于世界东方。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结束十年动乱，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国际上，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趋向缓和，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敏锐地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重要判断，并据此对中国外交进行重大调整。其核心是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强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继续高举团结反霸旗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把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方针，在关键时刻为中国把握住正确方向，稳住大局，为中国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推进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建设争取到宝贵的发展机遇。

冷战结束后至世纪之交的 10 多年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

的外交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指出世界正处于大转折时期，中国既面临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临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大竞争，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多极化趋势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要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要顺势而上，趋利避害，发展自己。针对美国推行一超独霸的行径，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强调要警惕“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型安全观，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外交往要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成功构筑了中国与各大国新的关系框架，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为国家经济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进入 21 世纪，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继续站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问题，坚持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结合起来，坚持从内外互动中把握外交工作的发展方向。胡锦涛主席指出，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努力，致力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继续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的外交政策主张，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统一，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的统一。

（四）既是中国，也是世界

中国外交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际领域的延伸，也是根据其精神实质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表述。在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紧扣中国发展和世界变迁，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和世界潮流，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中，在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的相互联系中，形成了四个结合：国内政策主张与各国进步意愿的结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结合，中国的和平发展事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的结合，中国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

“和合”思想，不仅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源泉，同时也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客观现实和人类寻求共同发展进步的真诚愿望，是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设做出的思想贡献，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通过走和平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之路，实现与世界的共同进步之路。其基本内涵是内求发展、和谐，外促和平、合作。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有力地展示了中国既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重视照顾他国关切，重视通过沟通增进了解，通过了解加强合作，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的政策主张。在和平发展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广交朋友和合作伙伴，大力开展互利共赢的国家关系，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中，有力维护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利益，为营造世界各国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平等互利的发展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谐世界”的主张，是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为解决人类和平与发展这两大突出问题提出的重要主张，也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倡导的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等主张，以及以对话求安全、以合作谋发展等合作共赢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升华。

三、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

60 年的新中国外交，取得了辉煌成就，更有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与不足。面对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外交事业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为进一步创造机遇，化解挑战，中国特色外交要以改革创新

新精神，不断在理论、实践方面开拓进取，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一）客观认识实力，做好统筹兼顾

方位决定方略。要认清中国兼具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新兴大国、文明古国等多重属性，科学地看待中国在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方面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辩证关系。统筹兼顾自身实力与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统筹兼顾自身实力与履行国际责任的关系，统筹兼顾自身实力与科学定位的关系，坚定地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行列，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全方位外交，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二）把握两个大局，实现三个结合

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机遇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既处于深化合作期，又处于摩擦多发期。要在历史关键时期推进各项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把国内的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统筹起来，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内外风险的能力。提高统筹兼顾两个大局的能力，关键要实现好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赢、和谐世界三大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的结合，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以科学发展促进和平发展，以和谐社会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深化全面合作，切实互利共赢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的精髓，解决了实现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实现中国利益与世界利益统一的途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在国际体系的各个领域实现平等民主，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和平发展问题，推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首先要扩充和深化互利共赢的内涵。可以说，和谐世界建设涉及多少方面，互利共赢战略也要涉及多少方面；中国走和

平发展道路涉及多少领域，互利共赢战略也要落实在多少领域。互利共赢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还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环保、科技、民间交往等各个领域。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在实践中不断拓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要利用好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及各国不断增加对中国的期待，更加积极主动、有针对性地推进全方位外交。将气候变化、能源安全、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新合作点，以合作实现共赢，以共赢带动合作。

(四) 重视形象建设，加强世界认同

国家形象是一国综合实力的反映和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能增强本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在他国民众心中产生比经济、军事力量更有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可以加强国家的外交运筹力量，使本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推动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主动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当前，国际社会总体积极看待中国，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趋于客观全面，主张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大。然而，世界聚焦中国，有欢迎和期待，更有疑虑和遏制。这既有不希望看到中国发展进步的小部分国际势力恶意制造形形色色的“威胁论”、企图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因素，也有因不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执政理念、政策措施而产生误解，因对中国实力期望过高而曲解中国的成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与世界沟通手段、交流方式的有限和不足。

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但通过改进工作，在增进世界对中国发展、社会变化、内政外交的了解、理解和认同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对内，中国要重视引导民众客观、理性和全面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提高对外交往能力，通过每位中国民众的努力，把爱好和平、重信守诚、崇尚合作的中国展示给世界。对外，要加大宣传、交流、市场运作力度。重视将对外宣传与对外大型合作项目结合，有

规划、有重点地推进国家形象建设工程。加强对技术人才、海外志愿者、文教卫生等方面“软外援”的投入，发挥华侨、华人等“软资源”的独特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一脉相承，是加强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独特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与西方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是架起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沟通的桥梁。“仁、义、礼、智、信”与“博爱”、“宽容”精神相通；人本主义、“仁者爱人”，重视使民以时、爱惜民力、民贵君轻，与“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有共通之处。“发奋忘食”的勤奋精神、“乐以忘忧”的快乐人生、“不知老之将至”的自强不息精神，与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乐观执著的人生理念遥相呼应。总之，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中华文明，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加深沟通和理解的纽带。同时，如何让延续了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向世界展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鲜明民族风格和浓郁时代精神的中国，也是在实践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注 释：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2] 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 25 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 67% 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3] 指中美两国发表的 1972 年上海公报、1979 年中美建交公报和 1982 年“八·一七”公报。

[4] 在过去 20 多年中，中国裁军 170 多万人，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5] 中国政府“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 年中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0% 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 10%。

[6]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7]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

[8] 1974 年 2 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一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9] “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线构想以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为理论依据。即把世界各国分别划归三个世界，根据中国对外斗争的需要，团结历史经验相似、现实任务相近的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与苏联、美国两个霸权有矛盾的第二世界国家，分化美苏两霸，集中打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主要目标是建立一条从北美、北太平洋到东亚、南亚、中东地区，再延伸到西欧的战略防线，联合国际社会一切反苏力量，共同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